乾嘉时期天津与英国的三次交往

林延清

明清以来，天津地位日益重要。它既是首都北京的门户，又是北方的交通枢纽，还是经营漕运和盐业的重镇。进入清朝乾隆、嘉庆时期，天津逐步形成为中国北方的商业中心，城市经济空前繁荣。但是，当时清朝政府推行闭关自守政策，中外贸易交往限定在广州一口进行，因而天津的商业贸易主要是国内贸易，即与辽东和东南沿海地区之间进行的产品交换，对外贸易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

天津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引起西方国家的注意，要求进行交流的愿望日益强烈。西方国家对天津的认识始于元代。当时天津还被称为海津镇。千里迢迢来到元朝大都（即今北京市）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对天津这块地方印象颇深，称之为"天城"。明朝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获准进京，也是自天津登陆的。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 年），荷兰使臣哥贡和开泽携带贡品，经天津进入北京。他们自海路抵达天津后，受到地方官员的欢迎，"当地政府的官员们到船上来欢迎我们，他们并且接见了大使"。[1]天津繁华的景象给荷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地方被认为是中国最著名的沿海城市。当时中国的主要港口有三个：第一个是广东省的主要城市广州；第二个是南京府的镇江县；第三个是位于顺天府东部边缘地区的天津卫，……。这个地方到处被庙宇所点缀，而且人烟稠密，交易频繁，象这样繁荣的商业景象实为中国其他各地所罕见。因为从中国各地驶往北京的船只必须通过此处，这种条件促进了漕运的异常发展，一艘又一艘的船只接连不断地来到这个城市的面前。因为是自由港，无论进口或出口的货物都不必缴纳税，这儿也是各种商品的集散地。"[2]这些记载虽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却是西方国家对清代天津的最早的全面描述和介绍。

荷兰人之后对天津产生浓厚兴趣的是英国。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当英国谋求扩大与中国的贸易时，清政府却把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口。这就引起英国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们为了扩大贸易市场，把注意力转向广州以北的宁波、天津等地，希望清政府能允许在上述地方与中国商人开展贸易活动。为此，英国做出了种种外交努力，这就使天津与英国的交往，在英国人采取主动行动的条件下展开了。

最早率领英船到天津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通事洪任辉。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清政府下令关闭浙海、闽海、江海等三关，仅留广州一口和英国等国进行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清政府此举十分不满，决定派遣洪任辉率领商船赴天津。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五月三十日，洪到达定海，声称欲到宁波贸易。清朝浙江官员不许他去宁波，令其返回广州。洪任辉见无法实现宁波开市的目的，就向当地官员呈上请求书："我有呈词一纸，要众位收去。我即开船。否则仍须赴宁报递。"[3]洪任辉离开浙江以后，并没有返回广州，而是按照预定计划，直接向北行驶，奔赴天津。

六月二十四日，洪任辉带领英船抵达天津大沽口外。当地驻守的清大沽营游击赵之瑛上船

查问。洪告诉赵说:"我一行十二人,跟役三名,水手八名,我系英吉利国四品官,向在广东粤门做买卖,……今奉本国公班衙派我来天津,要上京师伸冤。"[4]赵之瑛回答说,在他没有得到命令之前,不准船只驶入内河,有何事情须先向他说明,然后转达给天津的文武官员,并表示需要给他五千两银子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洪任辉以为要的钱太多了,船上没有这么多。赵则声称,他不能冒着被撤职的危险,以低于二千五百两的代价来做这件事。最后洪任辉只好给了他两千两才算完事。六月二十六日,洪任辉被送至天津。天津知府在问讯一番之后,收下了他的呈状,表示可以上达朝廷。六月二十九日,直隶总督方观承根据下属禀报,将事情详情奏报乾隆皇帝,还附上洪任辉的原呈、款单和英船的外文执照。乾隆帝对此事极为重视,特派钦差前往广州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查办。洪任辉亦由清官员伴送,离开天津,随钦差回广州对质。

乾隆帝认为英船不去广州而赴宁波、天津,是有内地奸民勾引,于是坐洪任辉以"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罪,"在澳门圈禁三年,满日逐回本国,不许逗留生事。"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十七日(1759 年 12 月 6 日),总督李侍尧传见洪任辉,遵旨把他拘留起来,押解澳门圈禁,不准和其他大班通信件,直到 1762 年 11 月才被释放。这就是所谓"洪任辉事件"。洪任辉到天津呈诉不仅未能使清政府开放广州以北的贸易口岸,而且还由于清政府颁布"防范外夷规条",而使在广州的贸易也受到更严厉的限制。不过,洪的这次天津之行还是有收获的,了解了黄海和渤海的情况,探明了由宁波赴天津大沽口的航道,为以后英船赴津准备了条件。

洪任辉之后,到达天津的是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这次中英交往可称为鸦片战争前天津对外交往中最重要的一幕。英国并不甘心洪任辉的失败,为了早日和中国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1792 年(乾隆五十七年),以补贺乾隆帝八十寿辰为名,请求清政府准许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节团自天津赴北京,晋见乾隆皇帝。按照清朝的规定,外国使团一般是在广州登岸,然后由陆路赴京。而英国这次则要由天津入口晋京。英方提出的理由是,"特使将携带英王陛下赠送贵国皇帝的一些礼物。这些物品体积过大,机器灵巧,从广州长途跋涉至北京,恐怕路上招致损伤,因此他将乘坐英王陛下特派的船只直接航至距离皇帝所在地最近的天津港口上岸。"[5]当然这里所言还只是表面的原因,英方还有更深的考虑,"这样走法比在广州上岸,再从广州通过内地取道陆路晋京要迅速的多。广州距北京有一千四百哩的路程,在这段长途上特使可能遇到很多阴谋和人为的阻碍。广东的官吏们惧怕特使到北京以后把英商人如何受压迫及中国官吏如何垄断取财的真象报告出来,以致影响他们的地位,进行破坏是想像得到的。"[6]

乾隆皇帝获知英国特地派遣使臣"进贡",补贺自己八十寿辰,自然十分欣喜,颁旨特许其由天津入京。考虑到天津港大船难于进口,乾隆帝还特意指示:"该贡船到天津时,若大船难于进口,著穆腾额预备小船,即将贡物拨运起岸,并派员同贡使先行进京。"[7]

六月二十九日,英使马戛尔尼与使团人员百余人到达大沽镇。清直隶总督梁肯堂奉乾隆帝之命,特地从一百多里之外的保定赶到大沽与马戛尔尼相见。梁驻节在大沽镇的海神庙,中英官员在这里举行了会谈。梁肯堂"威严庄重,举止文雅,在接见特使的时候态度却非常恭敬谦虚,没有一点骄傲自大的样子。"[8]这给马戛尔尼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会见之后,梁肯堂还举办筵宴,以欢迎使团。英国使团的到来也引起大沽民众的关注,"非常多的观众云集拢来看大使登岸","这些好奇的居民中,有不少是骑在马背上或坐在车子里,在我们(指英使团)停船的河边两岸挤满了人。"[9]

七月二日,英使离开大沽,继续沿白河航行。河两岸观看的人更多了,"许多人站着等候好久。妇女们又害羞又好奇,在门缝里或爬在墙上窥看。"[10]不过,英使似乎更乐于观察沿岸的风

土人情。他们对数目繁多的盐堆很感兴趣，“在一些村庄和市镇附近有许多棱锥形的堆积物，长度和宽度不一律，但一般都是十五公尺左右高。这些都是盐包堆积起来的，形象好似欧洲的泥炭堆。”[11]使团的一位名叫巴罗的成员还对盐堆进行了计算，“除去不完整的盐堆不计算在内以外，共有二百二十二大堆”，“每堆将包括一万四千袋盐，二百二十二堆将要有三百万袋盐。每袋盐约有二百磅重。因此，总共这些盐堆将有六亿磅重。”[12]惊人的数目反映了天津盐业生产之兴盛。

七月五日，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天津城，与先期到达的清总督梁肯堂和长芦盐政征瑞再次晤面。按照清朝礼仪，在会见和筵宴开始时，外国使节须向设在大厅的御座行三跪九叩礼。但马戛尔尼以这不符合英国的礼节，只是鞠了一个深躬。梁、征二人也未深究。事后，二人怕乾隆帝责怪，上奏时含糊其词地说英使履行了清朝的礼节。聪敏的乾隆帝觉察到有问题，在谕旨中要求梁、征二人在礼节问题上坚持原则，不可退让，“向闻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是其国俗不知叩首之礼，或只系免冠鞠躬点首。而该督等折内声叙未能明晰，遂指为叩首亦未可定。著传谕征瑞如该使臣于筵宴时实在叩首则已，如仍止免冠点首，则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觐见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13]不过，当此谕旨发下时，英使已离开天津赴通州了，因此并未收效。

七月六日，马戛尔尼乘船离开天津城，向通州进发。自六月十八日，英船到达大沽口外算起，使团在天津停留了近一个月。在此期间，他们不仅和中方一起完成了赴热河晋见的准备工作，而且对天津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他们写道：“‘天津’二字可以解释为天上境界，据称此地气候适宜，土地肥沃，空气干燥，阳光充足。它位置在两河的汇流，是中国北方几省的商业中心。”[14]同时，天津的官员和民众也通过和使团的接触，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实在是天津对外交往中空前的盛事。

马戛尔尼使华之后的二十三年，天津又迎来了英国派遣的阿美士德使团。这一次接触与上次较为融洽的气氛不同，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猜疑和纠纷。

英国是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提出使节访华要求的。英国外相在给阿美士德的训令中，要求他通过和清政府的谈判，达到中国开放宁波、天津等口岸，以及改善广州英国商人处境的目的。

嘉庆皇帝接到英国的请求后，以“外夷输诚向化，自应准其入贡”，但他接受前朝马戛尔尼使团的教训，知道“英吉利国遣使纳贡来禀所称仰慕中国德威，系外夷表贡常语，其实该国遣使远涉重洋，以纳贡为名，恐尚有干求事件。”[15]为此，他下达了有关接待英使的三项方针：一是英使如向清官员“恳请赏给口岸贸易，如上次请于宁波互市等事，该督即先行正词驳斥”；二是英使如在天津表现恭顺，可率其入京，“倘其意在要求或礼节不遵制度”，就“不令久候，即在天津筵宴遣回本国”；三是英使入京人数要比上次减少，“即减半亦可”，“沿途营房、墩台毋庸逐处油饰”。[16]调门显然比乾隆帝降低了许多。

阿美士德就是在这种低调的气氛下开始访华的。他们于嘉庆二十一年闰六月初四日（1816年7月28日）到达天津大沽口外。清廷负责天津接待的是工部尚书苏楞额和长芦盐政广惠。他们照例雇佣民船接运英使团人员和物品。但因海上风大，直到闰六月十一日，船只才得以出海。十九日，英使阿美士德到达天津城。苏楞额和广惠登上阿美士德乘坐的船，双方举行了会谈。苏、广二人将清政府接待使团的计划安排告诉英使。与上次不同的是，使团归国的路线有所改变。上次是由北京取道广州出境，而这次清政府准备让使团“仍著由天津登舟回国”。[17]阿美士

德对此颇有异议,“据云总是大皇帝恩典,只求多住几日,瞻仰天朝,更深感激”。[18]

不过,双方真正的纠纷还是在礼节问题上展开的。闰六月二十日,苏楞额和广惠举行筵宴,款待阿美士德。筵宴开始前,苏、广二人按照清朝礼仪的规定,要阿美士德“谢宴行三跪九叩礼后,再行入座”。但阿不肯依从,只应允行免冠拜揖、一俯首之礼。苏、广二人再三解劝,阿美士德最后也只是三免冠、九拜揖、九俯首了事。礼节纠纷的出现,给阿美士德天津之行蒙上了阴影,并种下了这次使华失败的种子。

在极其不睦的氛围下,英使阿美士德一行七十五人,由苏楞额和广惠陪同,于闰六月二十日离开天津,奔赴北京。这里,苏、广二人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本应在上奏英使筵宴时不行清朝礼节后,等候嘉庆帝的批文,再决定是否领英使入京。但这二人唯恐耽误原定于七月二日英使晋见嘉庆帝的日期,所以就不等嘉庆帝谕旨的下达,匆匆上路。至于礼节问题只得“俟沿途再行开导,俾知顺从。”[19]嘉庆帝接到奏报后,十分恼怒,责斥二人处理失当,但英使已在路上,无计可施了。果然,苏楞额和广惠在陪同英使进京的途中,并未说服英使改变礼仪上的态度。因而在他们抵达北京后,情况就恶化了。这导致了嘉庆帝与阿美士德晤面的流产。对此,嘉庆帝十分恼怒,“朕惟自责,不能知人,屡违谕旨,以致外国使臣干犯名义,成何事体!”[20]除处罚苏楞额、广惠、和世泰等接待官员外,还下令即刻遣送英使阿美士德等人回国。事后,嘉庆帝还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管束和限制中外贸易和交往。这之中对天津影响最大的是,不再允许英国船只再来天津,“现在天津口岸已奉大皇帝谕旨,不许尔国(指英国)船只再至该处收泊,如有违禁到彼者,该处官吏必立即驱逐,不准登岸。”[21]这就关上了天津与英国交往的大门,使天津刚有起色的外界联系又中断了。

从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的半个世纪时间内,天津与英国进行了三次接触与交往。这对天津认识世界、了解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只是由于清朝政府坚持闭关自守政策,这种交往才未能继续发展下去。这也使天津丧失了自身得以发展的大好机会。

---

①②雷穆森:《天津》,载《天津历史资料》第二期。

③④《史料旬刊》第四期第 116 页、第 114 页。

⑤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 28 页。

⑥同上,第 32 页

⑦《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五。

⑧《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 265 页。

⑨安德逊:《英使访华录》,第 62 页。

⑩《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 267 页。

⑪同上,第 268 页。

⑫同上,第 269 页。

⑬《乾隆朝上谕档》,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初八日条。

⑭《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 270 页。

⑮⑯《嘉庆朝外交史料》第五册,第 6 页。

⑰⑱同上,第 26 页。

⑲同上,第 30 页。

⑳同上,第 56 页。

㉑同上,第六册第 13 页。